

延安时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经验

□ 张珊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党史学习教育，第一次系统全面学习、总结了党的历史，传承、发扬了党的成功经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思想理论基础，也为党史学习教育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短时间内，大量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的新党员以及国统区和敌占区数以万计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进入革命队伍。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80万人。这些新党员、新干部满怀革命热情，但不了解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更缺少革命斗争的经验。基于抗日战争和边区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与党员干部自身素质现状的矛盾，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使党员在思想上与党组织保持一致，为中国革命凝聚强大的战斗力，势在必行。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向全党发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口号，他说：“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会后不久，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天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对干部类别、教育方针、学习方法、经费保障等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先后颁布《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明确各学校的定位和办学要求。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10月，苏联出版发行斯大林倡议并亲自参加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该书迅速传到延安，党员干部争相传阅。朱德曾讲：“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但是他们只收到七本，为什么呢？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地被抢光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仅成为延安学习运动的重要文献资料，也为中国共产党总结自身历史提供了借鉴。受其启发，1939年冬天，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共同编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为干部党

史学习教育的内容。到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明确要求将“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入干部学习的主要课程。此后，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等纷纷开设的相关课程，主要有“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世界近代革命运动史”等。其他学校也明确将党史学习列入教学要求之中，如八路军军政学院在教育要求中明确学员要“了解社会历史和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获得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经验”。各校党史课程的开设，标志着延安时期党史学习的正规化和系统化。

高级学习组率先垂范

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分为高级干部和全党的普遍学习两个层次。其中，党的高级干部是学习教育的主体，并始终引领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毛泽东在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认为党内高层在“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他在提议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同时，把举办高级学习组的党史学习作为“极重要的关键”。在毛泽东看来，党的高级干部如果不集中地、深入地学习党的历史，就无法清楚地了解过去的路线是非，也就无法形成全党的思想统一。因此，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该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

部集中学习党的六大前后的重要文件，研究党的历史。11月，中央通知要求在1941年内先将《六大以来》83个文件通读一遍，从学习内容和时间上对党史学习作了明确规定。在中央学习组的带动下，从1941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发动起来。

在党内高级干部对一些重大理论原则和历史问题基本取得共识后，1942年春，全党开展普遍学习。这一阶段的党史学习教育和整风运动交叉进行。3月30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表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研究党的历史。中共中央甚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规定，根据文化理论水平的高低程度，将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丁四类，要求丙类“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需要先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

根据整风和党史学习的需要，这一时期中央先后编印《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学习教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校、抗大、陕北公学以及各地革命与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内容主要围绕上述教材展开。这一阶段的党史学习与整风运动紧密相连。在整理学习党的历史文献基础上，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教育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进一步总结历史问题打下方法论基础。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



延安时期由中央统一编印的党史学习材料：《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等

决议》，把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予以深刻总结，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杰出贡献，为七大召开奠定思想政治基础。这是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第一次系统地进行党史研究和学习的实践创新活动

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教育方法多样、形式新颖，有总结报告会、小组座谈会、专人巡回讲授、心得体会交流，甚至还采用了歌曲、舞蹈、书画、舞台剧等创新方式，造就了“人人处在学习中，时时体现学习风”的浓厚学习氛围。当时的《解放日报》曾报道：延安的基层干部为了学习不睡午觉，有的人每天早晚甚至半夜，都坚持练生字、读文件……正是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党史学习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党史学习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本土化的过程。学习马列著作、党史文献，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现状和前景。杨尚昆回忆说：“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

统一了全党思想。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全党了解党在过去出现的错误路线问题、认识到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对形成党的正确思想领导、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至关重要。

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素质。党史学习教育使新老党员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深入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当时新党员克服存在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等倾向，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政治觉悟。

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教育开启了有组织、大规模党史教育的先河，是全党进行党史学习的一次伟大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为党今后开展理论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容城县烈士塔位于河北省雄安新区容城县城内金容中街老礼堂院内，始建于1946年，1947年被敌人破坏。1966年重建，占地1156平方米。烈士塔通高8米许，正面镌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毛体大字，背面刻有《重修革命烈士纪念碑说明》。烈士塔下方有四面塔碑：前面刻有《不朽的功业——献给我们的烈士》碑文附记，另三面镌刻着298名烈士名字。基座平台四角建有四座小侧碑，分别记载任凤翔、杨瑞森、文光斗、宋玉科等9位先烈的英雄事迹。碑文附记全文如下：

熬过长夜，盼见天明。八年来，咱们受苦受难在一起，工作战斗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战争的胜利，忍忍一切残暴的重压，向民族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

而你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走在大伙的前头，英勇顽强，冲开浓雾，划破夜空，在革命光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你们寻见自己的道路，使用一切武器，直捣敌人的心脏，用鲜血的热血洗刷民族的耻辱，更不惜以宝贵的生命换取民族的永生，人民的解放。

在“容徐”“容白”两条公路上，深刻着你们无数次英勇的战绩，拒马河，大清河，已记取你们作战的英姿，将永远奔腾歌唱。亲爱的烈士同志们！你们的光辉将永恒照耀着你们已获解放的故乡——容城一百六十个村庄，容城十六万人民。从稚子到白发，从白发到稚子，无分男女，将辈辈传颂你们勇敢的名字，在他们欢笑的生活里，流淌感激的热泪。

你们的功业是不朽的，你们的精神将永生！

我们度过漫漫长夜，不只八年。八年前，革命的拓荒者，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牺牲于反人民的刽子手刀下的烈士们，更使我们追念。你们是容城人民解放的最先锋，你们为后继者开辟出一条明光的先路。

八年后的今天，抗战胜利，和平即将实现，而反人民的刽子手，仍不忘其八年前的故技，使我们不少忠于民族、信守和平的同志，不死于日寇，而死于那些反动者之手，这使我们内心更充满深沉的悲愤！

天已微明，但还要走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已经留下最好的榜样，斗争不屈，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中共容城县委
容城县政府
容城县保安大队
容城县工农救青文各团体
容城县人民武装委员会
同献

碑文概括了容城县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封建势力、日本法西斯主义英勇斗争的动人事迹，记载着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光辉形象和丰功伟绩，是一篇激情澎湃的战斗檄文，一笔一滴泪，一字一滴血，一碑一精魂，读后令人肃然起敬、感动不已。

容城县是革命老区县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属于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中的三角地区。三角地区，就是北平、天津、保定三城市的中间地带。南有大清河、白洋淀，西北有北平和平汉铁路，东北有天津和北宁铁路。三角地区的形势直接影响到华北的整个战局。

用鲜血洗刷民族的耻辱

——河北省容城县烈士塔碑文敬读

□ 闫丽丹

1938年5月，吕正操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和孟庆山的河北游击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的三角地上，树起了第一面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冀中军民为了民族生存，在大牙交错、往返拉锯、你争我夺的三角地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奋力搏杀。吕正操等在冀中开创的抗日根据地，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起平津、南至沧（县）石（家庄）路之间，成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在庆贺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3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军急于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企图首先确保冀中，于是派冈村宁次纠集了5万多兵力，从1942年5月1日起对冀中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日伪军修起1700多个据点，修筑7500多公里公路、4000多公里封锁沟，把大平原分割成2000多块，冀中成为“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冒狼烟”的恐怖世界。容城军民挖地道53里、交通沟422里，运用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人民战争的方法和战术，进行较大战斗29次，毙伤敌人千余名，俘敌77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及其他战利品，开创了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冀中地道中，有容城县烈士塔镌刻的尹景芬、周文俊等多位烈士饮弹殉国时洒下的汗水与鲜血。

碑中记载的几百位烈士，是冀中红色革命史中一群可歌可泣、舍生取义、永不叛党的铮铮铁骨；威震敌胆、血洒桑梓的容三区抗日武装队长孔德明，人民一直用《十想》小调颂扬他的英雄事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任凤翔，在被敌人折磨喂毒、神经错乱，矢志以死前，嘴里一直重复一句话“共产主义是好的！”后人赋诗一首表达对英雄的无限怀念：“拒马河水浊浪翻，残松弱柳不胜寒。英雄毕生求真理，壮士全力除弊端。屢遭缱绻心不转，久陷囹圄志弥坚。晨曦可见身先死，一代风流不能眠”；砸盐店、举义旗，被敌人割下首级悬新城南门示众多日的文光斗；明代忠良后人、敌区神八路杨瑞森；神奇“飞毛腿”、英雄小八路宋玉科；掩护战友突围、誓以身躯保轩辕的刘济民……冀中，这片烈士们洒过血、流过汗的土地将永远铭记——中华优秀儿女用生命书写的困顿与搏击、顽强与悲壮、血性与柔情、坚毅与忠贞。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抗战时期沂蒙地区的妇女动员

□ 王善英

妇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革命战争年代，动员妇女参战是我们党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任务。抗战时期沂蒙地区的妇女动员就是我们党开展妇女工作的成功范例。

动员妇女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妇女是抗战的重要力量，妇女工作迫在眉睫。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党统一思想行动，制定了明确的妇女工作任务和目标，这成为成功动员妇女的前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根据这一形势，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妇女工作大纲》，明确指出“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的妇女工作总目标，即在动员妇女参加民族解放的进程中解放自己，将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相结合，为动员妇女指明了方向。

进行统一有序的组织。1938年五六月间，山东开始有计划地派出一些同志专门做妇女工作，首先在胶东，接着在鲁北、鲁南、鲁西等地。但由于当时鲁南的沂蒙地区封建思想浓厚，群众对党 and 军队认识

不清，加上我们党在妇女工作方面经验不足，妇女工作开展比较困难。针对这些情况，山东妇女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从恢复整理组织开始，成立了动员妇女参政参战的各级妇女团体领导机关，为统一动员妇女提供了有力保障。妇女组织中以妇教会最为普遍，县以下的团体名称为县、区、乡、村妇教会，专区以上称妇女救国联合会。截至1940年8月，山东工农青有组织的地方都建立了妇女组织，有组织的妇女达到31万，涵盖贫农、中农、富农、佃农、商人、工人等各种成分，兼顾各阶层妇女的利益。同时，还创新性成立了山东妇女宪政促进会（县区以下成立妇女宪政座谈会、研究会）。

沂蒙母亲王换于在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选为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村妇救会会长，不仅创办战时托儿所，照料抚养革命后代，还为我们党保存了《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等重要文件。源县松固村的于明英大娘也在八路军的引导下成为妇救会会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后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去参军。沂蒙母亲、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沂蒙地区成功动员起来的典型妇女群体，为沂蒙革命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广泛灵活的教育宣传。为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开办大批训练班、识字班、

夜校、俱乐部等，不断提升妇女教育。其中，识字班的学生多是中青年妇女，成为当时最普遍、影响最大的教育形式。据不完全统计，至1940年8月，山东省识字班有760多处，参加者约13万余人。1943年，莒南县有妇女识字班520多个，参加者15700余人。当时还流行着《识字班》之歌：

识字班来什么班，俺上夜校去上班。

一上上到下二点，回到家中去纺线，去纺线。

个人识字个人好，妇女地位提高了。

能看书来能看报，还能看个“白黑票”（当地钞票）。

有的妇女不识字，两眼瞪着干着急。

看书识字懂道理，想起过去干生气，干生气。

识字班教育大大提高了沂蒙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为妇女走出家庭、参政议政、拥军参战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至今，沂蒙地区还称呼未婚女青年为“识字班”，足见这一教育形式对沂蒙妇女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们党还运用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动员妇女。比如，运用群众大会、纪念会、戏剧、歌曲、小调、漫画、化装宣传、刊物等形式。著名的《反对黄沙会》（即《沂蒙山小调》的前身）、歌曲《跟着共

产党走》都诞生在抗战时期的沂蒙地区。为宣传妇女放足，八路军还编排了一些通俗易懂的口号：“今年种地人真忙，组织妇女把脚放，大脚赶路多稳当，放脚劳动多荣光”。还有生动形象的《放脚歌》：“小脚的行动站不稳呀，前走走后倒侧，站都站不稳，你看那大脚的走路多排场，姐妹们联合起呀，齐心把脚放”。这些非常贴近妇女生活的教育宣传使沂蒙妇女逐步解放身心并切实行动起来，成为我们党成功动员沂蒙妇女的关键。

一切从妇女利益出发。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从妇女生活实际出发，解决她们面临的实际困难，切实保障妇女各项权益。比如，根据妇女家务和农忙状况，减少妇女开会次数，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空洞的生产生活小组，减轻妇女负担；还颁布一系列暂行条例、办法、细则等，保障妇女在生产、婚姻、继承等各方面的权益。比如，1942年颁布《晋冀鲁豫边区产妇产婴儿保健办法》《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施行细则》，1945年颁布《冀鲁豫行署关于女子继承等问题的决定》《山东省女子继承暂行条例》《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等。在做妇女工作时，我们党始终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找到妇女“最迫切需要，最易于了解”，使妇女“得到利益的问题”开始，这是我们党成功动员沂蒙妇女的根本。